位于边缘的“另类”——从《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看周蕾的批评路径

南博采
西安翻译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DOI:10.32629/mef.v2i12.511

[摘　要] 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是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扛鼎之作，该作在颠覆一以贯之的阅读习惯的同时，亦开辟了一条全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路径。本文立足于著作本身，遴选该著作的方法关键词，从女性主义、细节、主体性与国族建构三个维度来对著作进行解读。
[关键词] 女性；细节；主体性；国族建构

"Alternative" on the Edge——On Zhou Lei's Criticism Path from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Nan Boca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Xi'an FanYi University

[Abstract] Zhou Lei's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 is a masterpiece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at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1990s, while subverting the consistent reading habits, it also opened up a whole new critical path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work itself, 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methodological keywords of the work, and interprets the work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feminism, details, subjectivity, and nation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women; details; subjectivity; national construction

当代海外华裔学者的批评理论带有强烈的“边缘性”特征，李欧梵对边缘身份的认识或许代表了大多数海外华裔学者的普遍心声：“我似乎地处边缘，我也故意采用一种‘边缘视角’”“边缘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我不受‘中心’情结的牵制，可以随意转换视角，扩展视野，由中而西，由美而欧。”边缘叙述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和叙述策略，开阔了海外学者的学术视野，他们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解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一种全球视野。他们既是华人，又具有西学背景，相对大陆本土学者，他们自然更加了解西方，然而长期置身于西方环境中难免导致对中国文化语境的隔膜。海外学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迫无奈的边缘位置到积极主动的边缘学术立场的转变。周蕾在这一边缘群体中是为数不多的冷静客观、言辞犀利而观点又极具说服力的一员。

1 女性：对传统阅读方式的颠覆

周蕾的专著《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充分展示了其凌厉的批评风格。此书从一个边缘位置来审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而且正如题目所示，女性、细节、现代性与阅读方式是该书讨论的主要内容。周蕾以“妇女”作为切入点，颠覆权威的阅读策略，从电影《末代皇帝》到通俗文学，再到五四经典文学的解读无一例外。周蕾认为并不存在纯粹的中国式的阅读方法或纯粹西方式的阅读方法，她致力于分析隐藏于阅读方式之后的权力宰制，这样的阅读方式在分析电影《末代皇帝》时就已经显露无疑。

该书首先通过外国导演贝托鲁奇拍摄的取材于中国的电影《末代皇帝》引出了看与被看的过程中主客权力关系问题。在介绍了导演眼中的中国形象之后，她分析了克里斯蒂瓦的《关于中国妇女》，并指出两者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将中国设想为单纯、阴性化和永恒的停顿。周蕾批判了贝托鲁奇和克里斯蒂瓦先入为主的中国观点，她认为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克里斯蒂瓦更多是在西方学术脉络中彰显出其研究意义，最终她得出结论“《关于中国妇女》一书主要是关于西方认识论上的不足，而非关于中国的书。”这是周蕾借西方理论来消解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偏颇看法的一个实例。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运用精神分析法寻求电影是怎样借助性别差异对社会进行直接的、固有的阐释，她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作为一种解释父系社会无意识建构电影形式的一种政治武器。劳拉·穆尔维认为，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父权社会中，看的快感已经分裂为主动的/男性的和被动的/女性的，居于支配地位的男性将自己的幻想投射在设定的类型化的女性形象上，女性在这里既被看也被展出，她们在被观看的同时也成为男性欲望的指涉。

周蕾在对《末代皇帝》中溥仪这位紫禁城中唯一的男性形象进行分析时，引用了劳拉·穆尔维关于“影像即女人”和“影像即女性特质化空间”的概念，透过影片外部摄像镜头与影片故事中建国后共产党对溥仪审讯情节的双重凝视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来将这一男性对象阴性化和奇观化，从而使得中国观众不仅产生对影片画面中中国人的认同，同时对电影叙事者与导演也产生共鸣。这样，周蕾成功将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运用于跨文化语境和族裔观者的分析之中，向我们展示出摄像机使得凝视对象变得被动和阴性化，从而揭示出性别和种族之间的权力运作关系。该种将各家理论拿来为我所用的方法亦可延伸到其他的电影文本解读中。这种自觉的文化认知一直贯穿在本书后面看似毫无关系实则都有一个共同指向的几章之中。

海外现代文学研究者对于被大陆官方所忽略的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鸳蝶派一直都是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早期的夏志清便是其中一员，他坚持站在反抗左翼叙事的立场，主张以纯文学、独立于历史政治之外的标准来评价现代文学作品。从《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始终以西方为参照系，借助李维斯与新批评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现代小说作品，在论及具体作品时总不忘与西方作品做以对比，从而反衬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不足之处，这样的批评模式无疑是在为西方言说，存在一定的文化殖民主义倾向。例如夏志清在分析徐枕亚的《玉梨魂》时虽然说明其中包含中国文学“悠久的伤感——情欲传统”，但是却站在一个完全西化的学者立场指出该部作品的局限之处在于感情上未能突破传统，未能像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用肉体来充分表现感情的丰富。周蕾指出了这种批评的局限性在于夏志清无法看出中国恋人在通俗作品里的身体局限本身是寓意丰富的举动，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情感剩余正是以肉体矜持的方式呈现”。当谈及林培瑞的社会学阅读方式时，周蕾指出社会学中要求的科学精确性与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建构本身是相互矛盾的，而这一矛盾又只能通过新批评等理论工具来解决，由此林培瑞的社会学研究方式便与夏志清的“纯文学”的阅读方式都存在严重的文化殖民主义倾向。在周蕾看来，造成传统阅读偏差的原因在于之前的阅读方式大都忽略了女性的存在，而性别可以显现出权力关系的运作方式，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利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从而展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中根深蒂固的问题。周蕾借用张恨水的《平沪通车》讲述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对中国意识造成的危机。她大量引用了本雅明《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艺术与接受关系变化的“氛围”理论，主人公被女色诱惑而财物被盗的结局说明了“在群众、火车、不确定性充斥的时代中，只能够以自己方法来阅读它者的人，输给了以它者阅读方式来进行阅读，并将它者阅读方式运用于自身的人。”挖掘《平沪通车》的现代性意义正是作者论述的目的所在，在传统社会中以娱乐性消遣性为首要特征的鸳蝶派小说在周蕾的解读下更多地具有了现代性的意义。

对鸳蝶派作品不厌其烦的解读是海外许多学者的旨趣所在，一方面因为鸳蝶派的作品一直受到主流话语的压制和忽略，被官方划归到无关乎家国建构等宏大主题的言情休闲小说之列，另一方面是由于以鸳蝶派为代表的晚清小说本身的确具有重新解读的价值，这种价值在不同学者的解读之下彰显出了不同的现代性意义，周蕾的解读立足于女性，而王德威对于鸳蝶派的解读却显现出了另一种现代性面向。

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发出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问，撼动了以“五四”为现代文学开端的传统观念。王德威认为，晚清小说的异彩纷呈已经显示出来文学的现代性因子，这被主流话语所压抑的现代性隐藏在鸳鸯蝴蝶派小说等五四之前的作品之中。依照他的这一论断，我们顺理成章就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并非西方冲击所造成，而是中国文学内部裂变的结果。虽然王德威极力突出晚清文学容纳现代性的多种可能性，但是他的论述存在明显漏洞。他并未区分作为“历史事实”和“历史叙述”的“五四”，把“五四”文学简单狭隘地理解为遵循单一的写实主义模式，“‘五四’作家急于切断与文学传统间的传承关系，骨子里其实以相当儒家的载道态度，接受了来自西方权威的现代性模式，视之为惟一典范。”“借用西方，不但不曾解放他们，反而阻碍他们向现代跨进一步。”而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文学是丰富多彩的，并不囿于单一的现实主义叙述模式。王德威在通过晚清小说重构文学中的现代性话语时，虽然一直强调自己对“西方权威”模式的反抗，但是在谈及晚清作家具体作品的时候，他又是极力证明西方对其产生的影响，晚清小说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这四个文类分别对应了现代性的欲望、正义、价值和知识范畴的四个面向，这四个面向几乎都是在借鉴西方的前提下得以生成的。王的目的虽然是为了证明晚清小说中的现代性面向和晚清小说与五四文学的传承关系，但是在具体的方法操作上还是跳不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圈子。而周蕾从性别入手，指出女性在现代小说中的地位之重要，并通过女性本身所具有的碎裂、身体等象征意义来彰显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现代性意义。她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在西方技术力量入侵的前提下得以发生的，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在中西二元对立结构中，文学作品在内容上肯定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迎合晚清时期大众的阅读消费机制和市场的需要。文学的传统价值和实用主义相互结合，体现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下中国传统意识的危机。与夏志清、林培瑞和王德威单一的阅读方式相比，周蕾并不关心东西方谁在言说上更有优势，她只是借助性别来为我们提供一种重新阅读传统的囿于成见的文学作品的可能。

2 细节、主体性与国族建构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似乎都是关乎家国、民族、阶级和一系列革命话语的宏大场景，少有学者重视对该时期文学作品的细节分析，因为五四以来的主流观点认为，细节叙事与宏大的国族建构主题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现代文学中的细节叙事与国族建构的关系究竟为何？这是周蕾与刘禾在进行现代性研究中共同关注的问题。她们二者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体现主体性意识的细节描写和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整体的国族建构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刘禾的《跨语际实践》重点从语言实践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性的一系列问题。作为一个语言学造诣极高的文学史家，刘禾着眼于处理翻译的文字层面，她收集了数量众多的外来语、新造词来为自己立论。在论述个人主义与国族建构之间的关系时，她借用鲁迅的被称为“国民性的一面镜子”的《阿Q正传》引申出“国民性”这一概念，继而又追溯了“国民性”这一词语的语义来源与历史变更，指出这一词汇在东进的过程中进行了怎样错综复杂的演化，最终指出“国民性”这一个词汇涵义的复杂性并非由文化和国度之间的差异造成，问题的根本在于语言本身所处的尴尬境地。要谈论“国民性”的实质何在就必须运用关涉“国民性”的一套特定话语模式，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无休无止的悖论：“国民性”应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人民普遍存有的一种特征的概括，“国民性”话语模式究竟依赖何种标准建立？这种标准是建立于西方还是东方？而事实上无论采取哪一种标准，最终都将陷入一种民族性论述的文化帝国主义陷阱中无法自拔。虽然刘禾搜集了广泛详实的有关“国民性”的史料，但是最终她认为要阐释清楚这一概念就不得不诉诸理论的武器，另外刘禾过分强调了国民性的神话性以及西方对其本质的影响力，而我们在周蕾对现代性与国族建构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到刘禾言语之间流露出的无可奈何。

周蕾指出：“现代性表现在两个相关但或不相容的自主性观念的矛盾之上：文学与文化的自主性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国族整体的自主性。”在传统观念中，细节抑或个人主义与宏大的国族叙事无疑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周蕾却提出了“社会本身即是种种细节”这一观点。她首先指出鲁迅、巴金、茅盾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男性作家作品中存在的阴性气质，并选取《家》中婢女鸣凤的内心独白、《虹》中进步女青年梅行素的沉思和《祝福》中处于社会底层的祥林嫂的语言描写，旨在说明细节描写对于不同主体生成的意义所在，细节叙事表现出现代性进程中个体之间具有的差异性，而革命的阶级意识形态和国族建构的理想在这种差异中被消弭于无形。在与张爱玲的《金锁记》等注重细节描写的一系列作品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周蕾明显地表现出了褒扬张爱玲作品细节描写的倾向，因为在她看来现代性既是细节也是整体，只有细节才能显示出历史中鲜为人知的知识论层面上认知的冲突。她接着用女性主义批评家奈欧米·肖尔、保罗·德曼、普实克等人的观点为自己辩护以证明细节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时期的重要性。最后顺理成章得出中国现代性叙事转向的困境在于“叙事企图‘看清’人性的暧昧之处，因而转向‘内在’，就在此时，统一国族意识的整体状态无可避免地被碎解——成为细节。”周蕾从细节叙事和女性角度解读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性面向，并指出细节与国族建构的对立统一的关系，透过她的阐释策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十足自信、能够将各种理论自如整合于文本分析之中并论证缜密的学者姿态，她运用理论的得心应手、论证过程的天衣无缝和最后结论的水到渠成，在同时期的学者之中鲜有人及。

与国内学者侧重概括、缺乏细读文本的宏观研究不同，海外学者更乐于运用“大题小做”的方法，将一个又一个的观点落实于具体的个案分析之中。《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的四章貌似毫无瓜葛，各执一词，事实上都有机地统一于“女性”“中国”“现代性”这些概念之下，而以上概念又是阐明东西方阅读政治的理论基础。周蕾的阅读对象来自西方，尤其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抱持轻蔑态度的海外汉学研究群体，她不厌其烦地穿梭于各类理论之间，目的就是要以西方式的话语来回敬西方。虽然周蕾对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文化传统研究不够深入，但是，东西文化的有效对话必须依赖于一套双方通用的话语体系，周蕾要想向西方读者展示一直以来被误读的中国文学，那么向西方理论话语妥协就是不得已的选择，然而妥协并非致敬。周蕾在前言中说：“我赋予自己一个双重任务——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法。”就这样层层紧扣、步步紧逼，周蕾最终达到了自己同时批判东方与西方偏颇阅读方式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总序[M].尹慧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3.

[2]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M].蔡青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

[3]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南博采（1986--），女，汉族，陕西鄠邑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

2018年西安翻译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结项成果：周蕾批评方法探究（项目编号18B09）；西安翻译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写作教学团队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ZT1710）。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